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2016秋季号

Autumn, 2016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学出版社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6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6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309-12785-0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157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6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主编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8 字数 263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785-0/H · 2685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 卢丽安

本期执行主编: 陈 靓

本期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 张 冲

语言学: 沈 园

翻 译: 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褚孝泉

高永伟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金 雯 李 征

曲卫国 孙 建

谈 峥 汪洪章

魏育青 熊学亮

郑咏滢

文学

论伦敦国王学院与伍尔夫女性主义创作思想 朱海峰(3)

世纪回眸: 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 卢 婕(9)

论跨媒介语境下《大都会》的身体符号认知叙事 杨 亭(20)

反视觉观与视觉中心主义

——古希腊模仿论的视觉张力解读 杨向荣(27)

《圣经》生态伦理新解 李 超 杜丽霞(33)

《咆哮女郎》与小册子关于“女性气质”的话语协商 杨 洋(38)

基拉尔“模仿欲望”概念的回溯及辨析 陶艳柯(43)

漂泊流亡路,何处是我家?

——评俄侨作家娜塔利娅·伊里因娜的《道路与命运》..... 李新梅(52)

重塑“阿卡狄亚”

——朱厄特短篇小说《白苍鹭》中的田园“乌托邦”

想象 崔永光 郭文丽(57)

讲述创伤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的时空解读 邢葳葳(62)

语言学

综述: 2003 年至 2013 年间巴赫金术语在挪威教育实证研究中的使用

..... 米哈伊·格拉德夫斯基(挪威) 段枫(译)(71)

认知视角下的外语学习者商务英语拒绝策略研究 蔡 晨(76)

从语言目的论看俄语目的义词语的界定 汪 吉(83)

英汉“取得”义动词与双宾构式互动差异的历时分析 胡 泊(87)

英语公众演说课堂

——一种跨文化外语教学实践初探 时丽娜(93)

翻译

考察中国现代小说早期英译集《草鞋脚》..... 许 敏(103)

战争预言诗英译研究初探

——以《推背图》第 39 象为例 许 明(110)

文 学

论伦敦国王学院与伍尔夫女性主义创作思想^①

朱海峰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先驱,她在日记、书信和演讲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女性身份使她不能享有同兄弟们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她是在父亲的图书馆中博览群书而自学成才的,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与她遭受的教育不公有关。然而,笔者通过考察伦敦国王学院档案馆文献,挖掘伍尔夫自1897年至1901年在该校女子系的就读经历,发现她这段鲜为人知的高等教育经历与其女性主义创作思想具有很大的关联。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a forerunner of Western feminist thought,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her diaries, letters and speeches that she did not receive the same school education as her brothers did because of her female identity, and she was self-educated in her father's library. Thus most Woolf's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her ideas of feminist writing are related to the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that she suffered from. Based on the discoveries in the archives of King's College Lond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Virginia Woolf's learning experience at King's College Ladies' Department, and study her ideas of feminist writing in relation to this lesser-known learning experience.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伦敦国王学院;女性主义;学校教育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King's College London; feminism; college education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②, 1882—1941)不仅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而且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先驱。她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但对于她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与其女性主义创作思想的关联却鲜有论及,其主要原因在于不仅伍尔夫本人多次在书信、日记和演讲中称自己是自学成才的,而且其传记家和学界内的大多数学者也持相同观点。例如,伍尔夫在1932年给传记家哈蒙·戈尔德斯通(Harmon Goldstone)的信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身体原因,我从未进入学校或者大学。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允许我在他的图书馆中阅读书籍。”(Woolf, 1979:91)同年,伍尔夫收到剑桥大学的演讲

邀请。对此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推测这是第一次女性收到邀请,这对我这样一个在海德公园门22号读书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Woolf, 1982:79)伍尔夫传记家赫尔明·李(Hermione Lee)及研究专家斯图尔特·克拉克(Stuart Clarke)也都认为伍尔夫是自学成才的典范(Lee, 141; Clarke, 3)。

尽管伍尔夫本人和一些学者声称她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她对学校的教育体制、学科设置、教学目标、财务状况以及女性的教育处境了解颇深,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多部女性主义代表作,如《从外面观看一所女子学院》(*A Woman's College from the Outside*)、《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和《三枚旧金币》(*Three Guineas*)等。对此,李儒寿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剑桥学术传统》中指出,伍尔

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WW043)和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科项目“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弗·伍尔夫‘新传记’研究”(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481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Virginia Woolf”有几种汉译: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吴尔夫及弗吉尼亚·伍尔芙等,本文在引用时采用第一种译法,在参考文献中沿用翻译者的译法。

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与布卢姆斯伯里的多数成员都在剑桥有过从教和就读的经历,因此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剑桥学术传统有密切的关联(李儒寿,13)。实际上,伍尔夫“从1897年至1901年5年内,也就是在15岁到19岁期间,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Jones & Snaith, 3-4)。笔者考察了伦敦国王学院档案馆的相关文献,发现伍尔夫并未获得该校毕业证书和学位^①。这或许是其否认求学经历的一个原因。但她在该系为期5年的就读经历不仅使其对英国教育体制有更直接的体验,而且对其日后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产生了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话题未被学界关注。因此,本文结合伍尔夫在该系就读期间的教学大纲、系刊、注册簿、教学进度表等档案文献,探讨伍尔夫在该校女子系的就读经历对其女性教育观、女性历史观及雌雄同体观的影响。

一、女性教育观

伍尔夫女性主义创作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关注女性在英国所遭受的教育歧视现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并没有得到普及,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仍拒绝授予女性学位。伍尔夫也毫无例外地遭受了这种歧视。她在给本·尼克森(Ben Nicholson)的信中写道:“我从未上过大学或者学院,我父亲花在我教育上的钱可能为100磅。”(Woolf, 1980: 419)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求学期间,伍尔夫按学期支付学费,每门课程的学费为一个基尼(Jones & Snaith, 7)。相比之下,伍尔夫的兄弟们却花费了高额的教育费用,因此伍尔夫在给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yth)的信中写道:“我没有接受教育,因为我的兄弟们花了家里的全部资金。”(Woolf, 1979: 195)伍尔夫对此表现出极度的嫉妒和愤恨。她在给索比(Thoby)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找不到任何人来展开争辩……我不得不从书本里挖掘,痛苦而又彻底孤独地寻找你每天夜晚同斯特雷奇等人坐在火炉边抽着烟斗就能得到的东西。难怪我的知识只能是贫乏的。我敢肯定,这里听不到任何教导者的谈话。”(转引自林德尔·戈登,116—117)伍尔夫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就读期间也感受到了英国

教育体制对女性的歧视。当时女子系负责人莉莲·玛丽·费思福尔(Lilian Mary Faithfull)指出,虽然很多女性有机会在该校女子系就读,但多数已婚女性只能从家务中勉强抽出一个小时来上10点钟的课程,而多数女孩的教育仍由家庭教师负责,她们在该系选择家庭教师不能教授的课程(引自Jones & Snaith, 6)。在伍尔夫就读期间,该系的图书馆是由地下室改造而成的,最初藏书只有800册。同样,该系的教室、实验室、公共休息室以及学生宿舍的条件也很简陋,远不及男校的设施。女性无权享受同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设施。伍尔夫早在该系就读时就切身感受到了英国教育体制对女性的歧视。后来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也揭露了这种现象:牛桥^②校园的赛马场规定“只有研究员与学者方能来此驻足”,对女性而言则是“擅闯禁地”(伍尔夫,2003: 4);牛桥闻名遐迩的图书馆规定“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者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同上,5);女性要想参加教堂的礼拜或宗教仪式,必须要“出示洗礼证明,或学监的引荐信”(同上,6)。

伍尔夫意识到女子学院与男校相比处于难以置信的贫穷处境,其原因主要在于女子学院得到的捐款数目远远落后于男子学院。伍尔夫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就读期间,该系也遭遇资金紧或短缺问题。1898年,伍尔夫所在的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的系刊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女子系经费的文章,讲述了一名匿名的朋友为校方捐赠了1万5千英镑用以还清校方的债务,而女子系对此有些嫉妒,因为如果把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拨给女子系,那么就能全面改善该系的境况,甚至可以用这笔捐资筹建奖学金,或者为图书馆添置急需藏书(King's College Magazine of Ladies' Department 1898, 3)。伍尔夫此时就在该系就读,对女子系的资金短缺境况深有体会,并在日后的作品中多次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例如,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了女子学院无法筹到与男校相同的教育经费。男校的主要筹款“来自商人和制造商的钱柜,来自比如靠实业发了财的那些人的钱囊。他们在遗嘱中将财富的一部分慷慨地回馈给让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伍尔夫,2003: 7)。于是男校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有了配备完善的、昂贵的精密仪器”(同上,7)。此外,男校的教员与学生午餐

^① 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的学位授予要求是学生在两年内每周至少要上四门课程,并且要以Class I或Class II的成绩通过所修科目的所有考试,此外至少要修一门有关宗教学习的课程。伍尔夫五年内只注册四门课程,通过考试的科目只有初级德语、德语语法与阅读两门。她注册的课程门数和通过考试科目门数都没有达到学校授予学位的要求,所以她未能取得该校的学位。(Department for Ladies Syllabus of Lectures, 1899-1900, p. 3.)

^② “牛桥”(Oxbridge)为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两个词的拼合。

可以吃上鲷鱼、山鸠、烤肉、菜心、甜点等(同上,8)。而女子学院筹款却要遭遇某某先生一分钱也不肯掏、《星期六评论》的粗鲁言行等困难(同上,16)。女子学院几经周折终于筹到了3万英镑,但“显然没有能力备办美酒与山鸠,支使头顶锡盘的仆役”(同上,17),学生们也不能“从容坐下来,畅谈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等等”(同上,17)。

伍尔夫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就读经历使她切身感受到了英国当局对女性教育的歧视,由此引发了她对女性教育困境的思考。她在作品中多次批评当局对女性的歧视,并探讨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她深刻地洞悉到女性遭受歧视的原因与其缺乏教育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她在《三枚旧金币》中指出,女性如果“不受教育,她们就无法自食其力;如果她们不能自食其力,她们就将再次局限于闺房之内的教育。”(伍尔夫,2001:1060)伍尔夫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就读的初衷就是要极力挣脱英国教育体制对女性的歧视。她在女子系所学到的专业技能不仅为她日后在莫利学院(Morley College)的教学奠定了知识基础,而且也为她小说中重建女性被忽视的历史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女性历史观

伍尔夫是一位有着历史意识的女权主义作家,她不仅在小说中展示其历史观,而且还撰写《未被书写的历史》(“Unwritten History”)、《历史学家与“这种吉本”》(“The Historian and ‘The Gibbon’”)和《琼·马丁夫人的日记》(“The Journal of Mistress Joan Martyn”)等文章阐明其历史观。伍尔夫从1905年至1907年在莫利学院教授历史课。学界大都认为伍尔夫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来自其自学经历。例如,霍托-杰克逊(Hotho-Jackson)认为伍尔夫历史观的形成与她童年时代在父亲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由爱德华·吉本、托马斯·麦考莱、托马斯·卡莱尔、沃尔特·司各特等历史学家编著的历史书有关(Hotho-Jackson, 296)。实际上,伍尔夫并非全部依靠自学掌握历史知识,她自1897年至1899年注册了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开设的英国历史和欧洲大陆历史两门课程(Jones & Snaith, 41)。英国史的授课内容涵盖了从16世纪中叶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至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治下的美国独立,而欧洲大陆历史则从17世纪中期法国路易十四登基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当时的任课教师为海军历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 Knox Laughton)(*Department for Ladies*

Syllabus of Lectures 1897-1898, 10-11)。

该系的历史课不仅为伍尔夫奠定了坚实的历史理论基础,而且使她认识到传统历史的主体是英雄人物,包括女性在内的无名小卒在历史上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伍尔夫早在该系就读时就撰写过有关历史主体的论文。1897年10月24日,她在给索比的信中提到了自己正在伦敦国王学院上历史课:“我必须要为历史课写完一篇有关历史主体的论文。下周二我就能收到老师批阅后的第一篇论文。”(Woolf, 1975: 11)从该课的授课内容上不难看出,当时历史课中的历史主体仍是英雄人物,而普通百姓,尤其女性几乎没有被写进历史,更没有女性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伍尔夫早在该系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就意识到官方历史对女性的歧视。她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反映了女性被历史边缘化的处境,呼吁女性要颠覆官方历史,增补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伍尔夫曾写道:“英国的历史是男性家系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对于父辈,我们多少总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卓越之处。他们或是步兵或是海军,或是出任公职或是制定法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有什么传说留下来?只有传说。某一位很美,某一位长着红头发,某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结婚的日子和所生的子女的数目,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转引自刘炳善,366)即使女性有历史,那么她们也是作为被男性虐待的“他者”而存在的。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如果我们在特里威廉的《英国史》中搜索“妇女”这一词条,就会发现书中对女性地位的描述:“殴打妻子是男人公认的权利,无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不以行使这一权利为耻……女儿如果拒绝父母为她选择的丈夫,很可能会被关在屋里,遭受拳打脚踢,公众对此也不吃惊。”(伍尔夫,2003:35)伍尔夫认为传统的历史有些“怪异、失真、偏袒一方”(同上,39),因此呼吁女性“何以不能为历史增补一章?”(同上,35)

在伍尔夫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课大都讲授以男性为主体的英雄史,并且这些英雄人物大都由战争塑造而成,因此这种授课方式很容易激发男性的好战欲望。尽管当时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历史课的授课内容也以讲授英雄史为主,但该系意识到了这种授课方式存在的弊端,因此强调历史课的教学目标不仅要向学生讲授历史事件,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在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1900年春季入学典礼上,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Oxford)院长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作了一场题为《历史学习》(“The Study of History”)的报告。在报告中,亨利·佩勒姆提出要从“人文主义角度看

待历史……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充分实现人类的尊严,其中女性作为道德与理性的存在也应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King's College Magazine of Ladies' Department 1900, 11)。同时女子系负责人莉莲·玛丽·费思福尔在1900年春季学期(Lent Term)系刊上发表了题目为《女子大学教育》(“College Education for Women”)的文章,提出该系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女性在道德、社会与精神上的素养,从而弥补她们曾经缺失的某种品格,并使她们终身获得快乐(同上,6)。正如克里斯汀·琼斯与安娜·斯奈斯所言,女子系系刊所讨论的这些议题对伍尔夫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Jones & Snaith, 37)。在多部女性主义作品中,伍尔夫批判了在父权文化中人性与道德的丧失,“戳穿了文学想象中女性形象的虚假以及历史书写的男权中心性质”(杨莉馨,308),倡导应用女性所特有的道德与理性来“解构男性的政治文化霸权”(朱海峰、申富英,74),从而建构女性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价值体系。在《三枚旧金币》中,她多次批判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历史,指出“打仗一直是男人而非女人的传统,……历史上少有男人倒在女人枪下;绝大部分鸟类都是被你们而不是被我们杀死的”(伍尔夫,2001:1027)。伍尔夫认为女性历史被男性边缘化的原因在于“她往往一不会阅读,二不会写字,始终是丈夫的附庸”(伍尔夫,2003:37),因此,她提倡为重建某女子学院捐款,并指出新式女子学院的教育目标“不是战胜他人的权术,不是统治、杀戮、掠夺金钱与土地”,而是“去探索人与人之间如何合作,发掘新的途径,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伍尔夫,2001:1056)。

三、雌雄同体观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人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伍尔夫,2003:85)伍尔夫在该文中一再强调:“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同上,91)。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与希腊语有着密切的关系。雌雄同体(androgyny)的词源来自古希腊语的“andro(雄)”与“gyn(雌)”,原指自然界的某些生物兼具雌雄两性,最早出自柏拉图的《会饮》(Symposium)。在该著中,阿里斯托芬指出:“开初的时候,人的性别有三种,不像现在只有两种。除了男的和女的,还有个

第三性,也就是男女两性的合体。”(柏拉图,48)阿里斯托芬所说的第三性的人则是雌雄同体的双性人。阿里斯托芬接着指出:“从前人之所以有三种性,乃因为男人原本是太阳的后裔,女人原本是大地的后裔,既男又女的人则是月亮的后裔,因为月亮自己兼有两者。”(同上,48)

正因为雌雄同体观与希腊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吸引一些学者从希腊语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的渊源。芭芭拉·法斯勒(Barbara Fassler)在《同性恋理论是布卢姆斯伯里雌雄同体的来源》中指出,包括伍尔夫在内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雌雄同体观来源于同性恋理论,并将其根源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所盛行的同性恋文化。西奥多·卡罗里斯(Theodore Koulouris)在《伍尔夫作品中的希腊文化与失去》中指出,正是在简·哈里森的影响下,伍尔夫才形成了具体的希腊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既不偏重于男性,也不绝对偏重于女性,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Koulouris, 178)。实际上,伍尔夫的这种两性综合的美学思想就是其雌雄同体观的实质。以上研究认为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与希腊文化颇有渊源,也认为伍尔夫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学习为这种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却没有提及伍尔夫在大学正式学习希腊语与希腊文化的经历。

实际上,伍尔夫从1897年秋季学期(Michaelmas Term)到1901年秋季学期注册了伦敦国王学院女子系的基础希腊语(Greek Elementary)、高级希腊语阅读(Greek Advanced Reading)、中级希腊语和课外辅导(Greek Intermediate and Private Tuition)、高级希腊语(Greek Advanced)和希腊语课外辅导(Greek Private Tuition)等课程(Jones & Snaith, 41),学习的教材主要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Coloneus)、希腊散文(Greek Prose)以及柏拉图的《伊安篇》(Ion)等(Department for Ladies Syllabus of Lectures 1899-1900, 22)。尽管雌雄同体最早的出处《会饮》一书不在该系教学大纲所必读的书目之内,但不能排除伍尔夫没有读过该书。此外,《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和《伊安篇》等古希腊的经典文学作品也都涉及雌雄同体理论。正如西奥多·卡罗里斯所言,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是其希腊美学思想的核心,而这种雌雄同体与希腊文学与文化颇有渊源。因此可以推断伍尔夫在女子系所学的希腊语词汇、语法和阅读等课程及阅读的希腊经典文学典籍为她日后形成的雌雄同体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伍尔夫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希腊语的经历不仅对她雌雄同体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而且还激发了她在作品中以希腊语教师克拉拉·佩特(Clara Pater)

为原型塑造了多个具有雌雄同体性格的人物。克拉拉·佩特不仅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第一位古典文学教授,而且也是剑桥女子高等教育促进会协会(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的核心成员,对英国女性的高等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尔夫在1899年秋季注册了佩特的中级希腊语阅读课程。佩特是对伍尔夫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她的“教学培育了伍尔夫与希腊文学的一生姻缘”(Jones & Snaith, 35)。在《岁月》(The Years)中,伍尔夫以佩特为原型塑造了吉蒂(Kitty)的历史教师露西·克拉多克(Lucy Craddock)女士。克拉多克是一个兼具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雌雄同体性格的人物。克拉多克具有女性浪漫的性格,喜欢把房间布置得具有浪漫情调,使用的雨伞的伞柄是鸚鵡头形状,家里摆放着采自荒原的野花。同时,她也具有男性的理性性格。尽管她对吉蒂满怀柔情,但理性告诫自己不要感情用事,鼓励吉蒂要“不惜一切争取你有的机会,会见你会见的人,认识你认识的人”(伍尔夫,2005:54)。《存在的瞬间:史雷特品牌的别针无尖端》(Moments of Being: Slater's Pins Have No Points)也展现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思想。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伍尔夫以佩特为原型塑造了具有雌雄同体性格的钢琴教师朱莉亚·克雷(Julia Craye)。朱莉亚认为女人如果结了婚,就要被迫放弃自己的一些习惯,失去了在“床上吃早饭”、“黎明步行去河边”的自由,而一旦生了孩子,境遇可能更无法想象,因此她拒绝所有男性的追求。但同时她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场长久的“拔河比赛”(tug-of-war),男女双方从这场比赛中获得了生活的激情,如果一方一旦彻底赢得了对方(enemy),那么“生活也就索然无味了”(Woolf, 1985:219)。从克拉多克和朱莉亚这两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出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的实质不是要彻底消除性别差异,而是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力主男女两性在相处的过程中消除对立状态,从而实现两性的平等与和谐。

结语

综上所述,伦敦国王学院是目前发现的伍尔夫唯一就读过的学校。伍尔夫在该校女子系就读期间,不仅接触到了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且接受了希腊语、历史、德语、拉丁语等学科的专业训练。伍尔夫的这段学校教育经历使她以局内人的身份洞悉英国教育体制对女性的歧视,不可避免地对她日后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发她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多部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作品。

参考文献

- [1] Clarke, Stuart. "Editorial." *Virginia Woolf Bulletin*, 3(2014): 3.
- [2] *Department for Ladies Syllabus of Lectures 1897-1898*.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ference KW/SYL 6.
- [3] *Department for Ladies Syllabus of Lectures 1899-190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ference KW/SYL8.
- [4] Hotho-Jackson, Sabine. "Virginia Woolf on Histor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4 (1991): 293-313.
- [5] Lee, Hermione. *Virginia Woolf*.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 [6] Jones, Christine Kenyon, and Anna Snaith. "Tilting at Universities: Virginia Woolf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Woolf Study Annual*, 16 (2010): 1-44.
- [7] *King's College Magazine of Ladies' Department*. Number II, Lent Term 190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ference K/SER1/1F0.
- [8] *King's College Magazine of Ladies' Department*. Number V, Lent Term 1898.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ference K/SER1/1F0.
- [9] Koulouris, Theodore. *Hellenism and Loss in the Work of Virginia Woolf*. Sussex: Ashgate, 2011.
- [10] Woolf, Virginia. *Leave the Letters till We're Dead: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6: 1936-1941. Eds.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0.
- [11] Woolf, Virginia. "Moments of Being: Slater's Pins Have No Points." *The Complete Shorter Fiction of Virginia Woolf*. Ed. Susan Dick.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 [12] Woolf, Virginia.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4: 1931-1935. Eds. Anne Oliver Bell and Andrew McNeilli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2.
- [13] Woolf, Virginia. *The Flight of the Mind: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888-1912. Eds.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5.
- [14] Woolf, Virginia. *The Sick Side of the Moon: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1932-1935. Eds.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9.

- [15] 柏拉图.《会饮》. 刘小枫,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16] 弗吉尼亚·伍尔夫.《三枚旧金币》.《伍尔夫随笔全集》卷三. 王斌、王保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7] 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 蒲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8]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 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19] 李儒寿.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剑桥学术传统.《外国文学研究》,2004(6):13-17.
- [20] 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伍厚恺,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21] 刘炳善.《伍尔夫散文》.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22] 杨莉馨.《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23] 朱海峰, 申富英.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反暴力思想.《外语教学》, 2014(2):72-75.

世纪回眸：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①

卢 婕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20世纪初以来我国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发轫与发展、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挫折与低谷和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回暖与复兴三个阶段。一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是当代“西学东渐”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正视、回顾和总结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有利于认识西方当代文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理性地思考新时期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方法与方向。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including formalism, the New Criticism,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structuralism, deconstruction, psychoanalysis, post-colonialism and western Marxism,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ose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 in China over a century's travel: the commencement and development from early 1920s to late 1940s, the frustration and depression from late 1940s to the end of 1970s, as well as the recovery and revival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end of 1990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modern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herefore, to retrospect and summarize its procedure in China is not only helpful to recogniz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rationally reconsider the ways to construc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in a new era.

关键词：理论旅行；西方当代文论；译介；中西文化交流

Key Words: theory travel;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translatio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黄金时期。然而由于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我国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译介与其在西方的发展并不同步，而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与操控。回顾20世纪西方文论在我国译介历史的钩沉有利于认识西方当代文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理性地思考新时期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方法与方向。

一、发轫与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期

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开始于20世纪20

年代，30年代中期到达第一次高峰，40年代逐渐衰退，经历了十余年的短暂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是视野开阔，与当时世界文坛的步伐基本一致。其中，对新批评的译介最为及时且数量最多，对精神分析的译介次之；对现象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则滞后于其在本国的发展且翻译的篇目较少，对我国思想界产生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1. 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的开端

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薛涛诗歌英译的文化过滤与补偿”（16SA0061）的阶段性成果。

20年代初。1920年第5号《民铎》杂志上发表了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1922年12月《文学周报》(第57期)刊载的仲云翻译的日本学者松村武雄的长文《精神分析与文艺》是见于20世纪中国最早的系统、明确阐述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文章分析了文艺中的各种性欲象征等,信息丰富,持论明确,对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924年,鲁迅翻译的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对中国现代精神分析批评有很大的影响。蔡斯翻译的弗洛伊德在美国的演讲集《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在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开始。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可以参见商务印书馆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名著《精神分析引论》(1933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5年)。高觉敷的译文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1940年,董斯秋翻译出版了1937年R·奥兹本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并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对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局限做出了分析和判断:“精神分析学不仅具有一般科学上常见的偏畸性,它的最大缺陷便在于它所承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范畴。”(奥兹本,1986:192)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说是在我国最早得到译介的西方当代文论。也是这一时期里较受关注的西方当代文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重视研究的开端。

2. 对新批评的译介是该时期我国在西方当代文论译介中获得的最丰硕的成果

中国对新批评理论的译介可追溯到1927年。朱自清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写的《纯粹的诗》的译文之后,“纯粹的诗”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1929年华严书店出版伊人翻译的瑞恰兹的《科学与诗》。1933年,《北平晨报·学园》译载了曹葆华的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其中包括他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1934年,卞之琳为《学文》月刊创刊而翻译了新批评的“宣言”之作——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的译文比曹葆华的译文被引述得更多,影响更大,因此他的译介被视为新批评作品本体论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集中翻译了艾略特和瑞恰兹的作品。彼时新批评理论在英国还处于萌芽的初期,中国对新批评的译介几乎与它在本土的诞生

同时。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得到了迅猛发展。1935年9月《文学季刊》刊登了施宏告翻译的《批评理论的分歧》,该文是对《文学批评原理》第一章的翻译。1935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双月刊)第一册刊载了周熙良译的艾略特的《〈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序说》。1936年2月号的《文艺月刊》刊载了涂序瑄译的《论诗的经验》,这是《科学与诗》第二章的译本。1936年10月,《师大月刊》第30期刊载了赵增厚译的艾略特的《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现代人的观念》。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1934年叶公超为之作序)。而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文集当属1937年曹葆华编译的《现代诗论》。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理论界引起了较大冲击。曹葆华是我国早期在新批评的译介中翻译新批评著述最多的译者。除《科学与诗》、《传统与个人才能》外,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现代诗论》中,亦有他所译的艾略特的《批评底功能》、《批评的试验》,瑞恰兹的《诗的经验》、《诗的四重意义》、《实用批评》等文章。

一方面由于20世纪40年代新批评开始在美国兴盛,另一方面由于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的学术活动极大推动了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40年代中国对新批评的译介有进一步的发展:袁可嘉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理查兹的“最大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相结合,并针对当时现实主义诗学主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提出“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他把新批评的艺术本体论思想同中国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开启了新批评的“中国化”之路。总的来说,无论从译文的及时性和影响力,还是翻译篇目的数量与质量来说,对新批评的译介是该时期我国在西方当代文论译介中获得的最丰硕的成果。

3. 在其他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中体现出该时期我国译介的开放性特征

尽管在该时期我国对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成果较少,时间上也滞后于其在本土的发展,但这些零碎散乱的翻译是构成我国早期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体现了我国早期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时怀有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

中国对现象学的译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樊炳清编纂的《哲学辞典》对“现象学”这一词条进行了解释。然而,彼时

的“现象学”是取黑格尔和康德之意,并非胡塞尔所指之“现象学”。1928年3月《民第》杂志第九卷第三号中,刘崇谨翻译了日本存在主义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现代的哲学》一文,介绍了当时被称为“胡色儿”的哲学。1929年1月《民铎》杂志第十卷第一号刊出杨人梗编的《现象学概说》。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胡塞尔“现象学”在中国译介的肇始。但是,在这之后,现象学的译介在我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沉寂:从20世纪30年代到改革开放近50年时间,国内仅有的对现象学译介的重要资料为1963年6月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书中收录了熊伟选译的《存在与时间》的扉页语和部分章节,以及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信。现象学的译介在我国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的发轫和发展时期可谓是“昙花一现”。海德格尔曾在回忆录中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海德格尔,1996:84)或许一方面由于现象学理论本身具有的难以言说的特质,另一方面由于它与中国老庄思想的不谋而合,反而使它失去了“异质性”文化的吸引力,这一在西方风靡一时的理论在中国对西方文论译介的初期遭到了出乎意料的冷遇。

俄国形式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滥觞,于1915年至1930年在俄国本土非常盛行。我国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最早译介是1936年11月出版的《中苏文化》第1卷第6期刊登的《苏联文艺上形式主义论战特辑》。但是由于形式主义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形式的绝对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遭到斯大林主义的压迫而停止了在本土的发展。它在本土的境遇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它的进一步译介与传播。俄国形式主义在早期中国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中的影响非常有限。

我国对结构主义的介绍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刘复翻译的法国学者保尔巴西著的《比较语音学概要》反映了结构主义语音学思想。1932年大江书铺出版的陈望道著的《修辞学发凡》介绍了索绪尔的一些关键概念。1939年岑麒祥编的《语音学概论》通过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学者的语音学著作,对“音韵学”、“音素”等结构主义概念进行了详细介绍。由于这一时期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尚未形成,我国对结构主义的译介以语言学为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文论。

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契的作品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935年在

《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的卢卡契的《左拉与现实主义》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对卢卡契美学思想的翻译介绍。随后,1936年《小说家》刊出胡风翻译的他的《小说理论》的第一部分《小说底本质》,1940年《文学月报》发表王春江译的《论现实主义》,1940年12月《七月》第六集一、二期合刊吕荧翻译的《叙述和描写》。应当说,卢卡契的思想观点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和制约。首先,中国对西方当代文论译介的发轫期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学界把西方文论视为“新”与“先进”的代名字,精神分析、新批评、现象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正好满足了中国学者追逐时代新潮,欲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心理需求。其次,瑞恰慈、燕卜苏、翟孟生等西方学者在中国以及朱自清、叶公超、赵萝蕤、曹葆华、李安宅、钱钟书等中国学者在国外的学术交流对这个时期的译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对新批评的译介中,正如赵毅衡所说:“新批评重要人物与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密切关系:瑞恰慈前后六次到中国来,1979年在中国讲台上倒下;燕卜苏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1949年后坚持在北京大学教课迎接解放,这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美谈。”(赵毅衡,2012:139)最后,20至40年代的译介受到了当时整个国家时局与翻译环境的影响:“在‘翻译年’(1935)前后,英美文学作品译介量迅速飙升,1933—1937年五年间,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多达307件,而1938—1942年则才150余件,1946—1948年每年都近百件。”(廖七一,2000:64-65)翻译环境的状况引致早期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在30年代达到了高峰期,但是由于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这个时期的译介均难免呈现出零散性,难以形成体系。

二、挫折与低谷期: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期

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奉行苏联的文艺政策,西方当代文论被看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潮而受到抑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加剧,西方当代文论被等同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史无前例的批判。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在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遭到了严重的阻滞。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我国的文学理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周宪,2001:1)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力渗透和压力。

1. 大多数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陷入“停滞”状态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形式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等在前一时期被零星译介到国内的西方当代文论被认为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悖而被中断。而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等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当代文论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特殊的文艺路线而被拒斥于国门之外。当这些西方文论在欧美思想界掀起狂澜时,中国大陆在思想和学术上正处于对西方理论的抵抗时期。这段时期我国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西方当代文论译作几乎为零。中国对大多数的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在这一时期陷入“停滞”状态。

2. 少数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以“批判”的形式继续

尽管该时期是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译介遭遇严重挫折的时期,但由于前一时期新批评在国内风靡一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掀起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以及结构主义在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中国很难对这三个流派的文论“视而不见”。出于“批判”的需要,对这三个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得以在特殊时期继续。但是,在“文革”极左的政治气候中,“认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都是先进的;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腐朽的。”(李晶,2008:46)这些西方当代文论大多供内部高级人员参阅并作为反面教材“内部发行”。

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中国建国后提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忽略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新批评与国家提倡的文艺潮流相悖,中国对新批评的译介陷入了沉寂。在6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环境对文艺思潮的进一步操控,新批评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62年,袁可嘉率先批判艾略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袁可嘉,1960:14-29)。但在批判之后,他对整个新批评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它的源流考察、对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概括以及对新批评派的有机形式主义和语义分析的简述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除了袁可嘉之外,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也出于“批判”的需要译介了

“新批评”的一些名篇。如下之琳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杨周翰译的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张谷若译的兰色姆的《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麦任曾译的燕卜苏的《复义七型》、袁可嘉译的布鲁克斯的《反讽——一种结构原则》,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译文是国内关于新批评的仅有的中文资料。同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登了蒋孔阳译的韦勒克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几个主要倾向》,1964年又刊登了石浮译的韦勒克的《批评的一些原则》。但“编者按”中论述道:“魏列克主张探索‘文学的人性本质’,主张就文学作品论文学作品的方法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否认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否认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文艺基本原理。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前提下,人自然就变成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概念了。”(魏列克,1964:9-13)可见,20世纪60年代的新批评译介主要是出于“批评”的目的,或借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材料”的名义才得以继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新批评的译介被完全中断。

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为“西马非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道出了这段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境遇。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卢卡契被当作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批判和否定,这种国际环境致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翻译卢卡契三本影响巨大的哲学史著作:《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青年黑格尔(选译)》和《理性的毁灭》。尽管当时译介这些著作的唯一目的是“供批判用”,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被批判得最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悖论性地成为被译介得最系统和全面的西方当代文论。

1957年第8期《中国语文》发表刘湧泉译的苏联学者卡勉斯基的《关于结构主义的几点意见》。同年《俄文教学》发表了《结构主义及其方法》,并连载了杰格捷列娃的《欧洲语言学说简述:19世纪至20世纪》。1958年是中国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引进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年:岑麒祥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发表了《介绍〈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方言地理学研究〉》一文。他编著的《语言学史概要》也于同年出版。书中第十一章“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及其主要派别”介绍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三个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50年代结构主义的引进主要受苏联语言学影响。中国对结构主义的讨论主要集

中于语言学层面。

从70年代中期开始,当结构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冲击下在西方的影响力江河日下之际,结构主义批评才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国最早译介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是张汉良、郑树森、周英雄等港台学者。我国大陆对结构主义的译介开始于1975年《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第4期上刊登的题为《近年来欧洲结构主义思潮》的文章。这篇文章批判结构主义的出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哲学社会思想体系崩溃的终极体现,其理性意义岌岌可危。1978年,《哲学译丛》连续发表了几篇阐述结构主义批评的文章,但都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较大的反响,当时的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并不走俏。

总的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西方当代文论在我国译介的挫折与低谷期。形式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等“老牌”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陷入“停滞”;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等新兴理论进入中国的译介之路也被完全阻断。仅有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因“批判”的目的,或以“批判”的名义在极小的范围内存续。

三、回暖与复兴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文艺思潮开始在中国大陆地区“解冻”。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西方当代文论在我国译介的回暖与复兴期。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教义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新一轮对西方理论的膜拜和大规模的翻译与接受。

1. 对形式主义的译介

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提到了作为结构主义先驱的“俄国形式主义”,重启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译介。1980年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被翻译出版,是我国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专章介绍的首本专著。1986年第5期《当代文艺思潮》刊载伍祥贵译的《俄国形式主义》。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首个十年的译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逐渐为国内所知。不过这些初步的译介显示出了不同的评价倾向:“‘形式主义’一词这时并不是一个纯学术词语,而是一个含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词语。”(陈建华,耿海英,2009:197)部分译介文章对“形式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否定性评价和过于

简单化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该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了阻碍和误导作用。尽管如此,由于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持续稳定深化和发展,国内展开了文学理论的大讨论,形式主义开始从西方文论的大背景中凸现出来。专门译著成为国内传播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方式:如托多罗夫编选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1989)、什克洛夫斯基等著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1989)、什克洛夫斯基的专著《散文理论》(刘宗次译,1994)、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1989;邓勇、陈松岩译,1992)。另外,文艺期刊对国内形式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1993年第2期分别发表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著名论文《艺术即手法》和《词语的复活》,《国外文学》1996年第4期发表了张冰译的迪尼亚诺夫的论文《文学事实》。总的来说,形式主义在这个时期的译介盛极一时,对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 对新批评的译介

70年代末,新批评在中国大陆再次成为焦点。赵毅衡总结道:“到70年代末新时期,这个‘打开窗子’时期,中国学界目不暇接,新批评成为这个理论热潮的前驱。新批评第一次得到深入研究,有一大批重要著作联系翻译出版,在文化界掀起了巨大波澜。”(赵毅衡,2012:139)从文艺期刊来看:曹庸重译的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杨周翰的《新批评派的启示》以及董衡巽译的沃尔顿·利茨的《“新批评派”的衰落》影响最大。从专著来看,1984年刘象愚等人译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引发了一场有关本体论、内部研究的大讨论并由此而使新批评在中国广为人知。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安祺等人译的韦勒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泓和余微合译的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国学者对以上西方新批评代表人物的著作的翻译为新批评的“复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从译文集来看: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毅衡的《“新批评”文集》是迄今为止研究“新批评”的经典权威文集。朱立元指出“新时期伊始,学界逐步对以往单一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伴随着文学创作走向繁荣,贫困和僵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丧失了对创作实践的有效阐释能力。”正是基于这种接受语境,新批评在西方文论的整体参照体系之下凭借其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倚重得以在中国复兴。

90年代后,我国对新批评的译介持续发展。从